

莎士比亚耽误了外语教学?

■本报记者 陈彬

不久前,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和《中国外语》杂志社发起的第八届全国外国语学院院长论坛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举行。中国外文局副局长黄友义应邀在论坛上讲话。为了准备讲话内容,他找到外文局的几位老翻译,请他们为当前的高校外语教学提提意见。一位老翻译脱口而出:“让他们少教点儿莎士比亚,少教点儿外国文学。”

论坛上,黄友义将这条意见提了出来,随即引起了一场关于“莎士比亚”与“外语教学”的讨论与反思。

河北的省会是宁夏?

对于老翻译的这条意见,黄友义也是赞同的。作为论据,他举了这样一个例子。

2003年,国家开始实行翻译专业资格(水平)考试,其中面向高校大学生推出了3级(最低档)和2级(中级)两个等级,至今共有约3000名翻译硕士参加了2级考试,但通过率只有10%,而这项考试的整体通过率是14%。

“职业翻译的考试内容完全按照实际工作的需要设计。这一现象的出现,说明学生毕业时的英语能力与实际需要存在很大落差。换句话说,我们必须反思目前的外语教学是否对路。”黄友义说。

他表示,业内其实很希望高校的外语教学与现实生活结合得更紧密些。而要做到这点,就必须在教学内容上做文章。“外语能力的提升其实有很多的办法,比如不读莎士比亚,而是读一些奥巴马的讲话或者白宫发布的新闻,是否也可以提升学生的能力?”

在论坛上,提出这一问题的并不止黄友义一个人。

曲莹璞是中国日报社的副总编辑。来论坛之前,他曾统计过近几十年来,该报招收新员工的专业背景情况: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新员工几乎全部来自外语专业;2000年前后,有一半的新员工不是外语专业出身;而如今,几乎已经看不到外语专业的新人了。

“在当今的时代,媒体要求员工必须对国情和某一领域有一定了解,这种要求甚至比语言能力的要求更迫切。而据我的观察,有些外语专业的学生在写文章时,甚至能将河北省的省会写成宁夏,将西藏写成省。我们希望学生能更加了解现实,而这些内容显然也不是‘莎士比亚’能够带给他们的。”曲莹璞说。

作为外文局的副局长,黄友义常常到高校进行交流。在与外语专业的研究生接触时,有

些学生曾悄悄告诉他,他们更喜欢与业内专家交流,而不太欢迎其他学校的老师。

“我问他们为什么,他们说自己的老师已经将一些理论都讲完了,其他学校的老师讲授的内容也差不多,还是业界的讲座更有启发。”黄友义表示,这说明学生们也对一些贴近现实的内容更感兴趣,高校的教育必须注意到这一点。

别把外语教学交给 BBC

如果减少传统文学在外语教学中的比例,随之而来的问题便是:什么内容应该相应地加大比例?

外交部前新闻发言人刘建超在卸任后,曾与黄友义有过一次谈话。在谈话中,刘建超说自己之所以具备了出色的外语交流能力,除了在大学的课堂学习外,还得益于自己长期坚持阅读英文刊物《北京周报》,正是这份富含国内时政资讯的刊物,使他在掌握大量词汇的同时,也了解了中国的基本国情和国策。

然而,目前高校中的情况却并非如此。黄友义说:“学生们正在大量收听、阅读的是以BBC(英国广播公司)为代表的英美广播电视内容。对英语学习来说,这些内容也许‘原汁原味’,但缺少了我们自己的价值观。”

这其实也是曲莹璞在工作中遇到的一个切实问题。“外语专业的学生很容易‘西化’。在新闻报道中,这样的倾向要更加明显一些。这也是学生们长期接受国外传媒影响的结果。”他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必须有自身的价值体系和文化体系。“我相信现阶段我们选择的发展道路是正确的,但如何让年轻一代去接受它却是个问题。我们必须让他们具有自己的价值观。”

曲莹璞坦言,国内学生其实更应该阅读一些由国内出版单位刊发的,能够反映社会主流价值体系的英文读物。也许有人担心这样的读物不是原版英文,其实随着国内外人才交流的日益频繁,国内出版的英文报刊文章背后,都有一个庞大的国外人才组成的译校队伍,这样的担心没必要。“重要的是,我们不能把我们的外语教育交给BBC。”

我们在学“上身西服、下身短裤”的英语

在呼吁“莎士比亚”远离外语教学的声浪之外,对莎翁的挽留之声也并非没有。西南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傅勇林便是其中之一。

除了担任院长职务外,傅勇林还有另一重身份——四川省成都市副市长。几周前,他刚

长期以来,以莎士比亚名著为代表的外国经典文学作品,一直是国内外语教学的重要内容,但在日益现代化、全球化的今天,这样的设置是否依然合理?

刚以这一身份参加了一次全球性的财富论坛,论坛中的一个细节让他印象深刻。

“这次论坛聚集了众多全球500强企业的CEO。”傅勇林说,他们在演讲时,所说的全部是纯正而又优雅的英语,遣词造句中蕴涵着浓厚的文史修养,其对世态人情的见解之深刻,不是一般草根阶层所能达到的。“我们无法想象如果不读‘莎士比亚’,他们能否有如此教养。这也使我们不得不思考:教育的真正意义是什么?”

傅勇林表示,所谓教育,“教”是传授知识,“育”则是人格培育和成长。我们的民族需要有丰富生命形态,以及深刻见解、洞察力的人。而要培养这类人才,就不能抛弃前人的智慧。“我们希望培养的学生‘根深叶茂’,但‘叶茂’的前提是‘根深’,相信那些商界精英表现出的睿智,就是根植于他们自身的文化自信和文化尊严,植根于他们对传统文化的尊敬,如果仅仅出于使用目的,恐怕难以实现。”

具体到外语教学,傅勇林表示,目前我们的主要任务,并不是简单地提高学生英语交流和运用能力,而是不断提升学生的文化洞察力。



“在外语文化中,每个词都有自己的历史和特殊含义,但我们的教学并不注重挖掘这些文化内涵,导致学生仅仅是将词语简单地‘搭建’成语句,根本不管语句是否协调。这样的语句就像一个上身穿西服,而下身穿短裤的人,让人看起来极不舒服。”傅勇林说,词语中的古香古色与下里巴人有很大区别,但国内学生却很少察觉。

“语言能力的最高境界就在于‘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但我们的学生却只会说‘人话’或只会说‘鬼话’。要解决这一问题,我们需要阅读的可能就不只是‘莎士比亚’了,甚至要在更古老的文学著作中寻找答案。”傅勇林说。

当然,傅勇林并不认为外语教学需要使每一名同学都掌握“古香古色”的外语。“英语教学分为两种,其一是培养能代表中华民族文化尊严,能讲出一口优雅而雅正外语的人才;另一种是要面向市场,或许后者的比例相对较大,但不能因此就否定‘莎士比亚’的重要性。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走向世界,而走向世界的中国才是真正强大的中国。”傅勇林说。

国际教育观察

一样的卓越追求 不同的卓越路径

■侯定凯

如今,“卓越”已成为一个国际化的公共政策语汇和目标。政府重点资助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也正成为许多国家和地区追求学术卓越、赢得知识生产和人才竞争优势的战略措施。这其中包括中国的“985工程”以及后续的各类卓越人才培养计划、韩国的“头脑强国21”、日本的“全球30”、德国的大学卓越计划,以及台湾地区的“5年+500亿计划”等。

这些大学卓越计划虽然名目不一,但有一些相似点:政府斥巨资分批建设一流大学和学科;强调科研成果的知名度和竞争力;鼓励大学与产业界和国际学术界的交流与合作(例如,德国卓越项目的评审专家中,有80%的人员来自国外);以国际大学排行的结果评估大学的卓越水平等。

各国大学卓越计划的发起和发展都伴随了诸多争议和批评,但也提供了高等教育改革的重要契机。卓越计划对参与大学的论文产出、成果被引用率、大学国际化程度、学术新手的培养、国际大学排名成就只是一个国家庞大且高质量科研基础的“冰山一角”。德国社会学家米歇尔·哈特曼从另外一个角度,对精英大学是否真正有利于科学发展的提出了质疑:在法国,精英教育机构不一定和科研水平挂钩,精英大学的一个功能是复制本国的精英阶层,而不是实现科学上的卓越成就。

教学工作和学生培养的贬值和边缘化,也是各国大学卓越计划一个让人忧虑的副产品。以德国的卓越计划为例,参与联合科研项目的教授,通常被要求大幅减少教学任务。学术卓越指标经常难以诠释大学教育之魂。此外,庞大项目预算的浪费、资源竞争中大学办学特色

的消失、人文学科研究的弱化等,也是不容回避的问题。

联系各国原有的高等教育制度背景,我们可以进一步观察到各国卓越大学建设政策存在的一些不同取向。例如,德国的卓越计划可以看做一种对原有均衡体制的市场化改造。为了提高学术竞争力和管理的灵活性,2006年,新加坡政府对新加坡国立大学和南洋理工大学进行了企业化改造,这两所大学不再隶属于政府,而成为非营利性企业机构,通过修改大学章程,大学理事会和管理层将拥有更大的行政和财政权限;同时通过订立协议书,政府加大了两所大学的问责制,并在特定科研领域继续投入资金,确保其达到世界一流水平。而在日本和中国,一流大学的政策更多地强化了原有的院校分层结构。在澳大利亚、爱尔兰、挪威等国,政府则旨在建立一种横向分化、更加均衡化和强调提高学生体验的高等教育体系。

我们还注意到,与科研卓越计划形成互补之势的“教学卓越”计划,也正在世界各地兴起。我国教育部近年陆续推出了卓越工程师、卓越农林人才、卓越法律人才、卓越医生、卓越教师等教育培养计划。2005年起,台湾地区对没有获得科研卓越奖励的高校实施了奖励大学卓越计划、重要特色领域人才培养计划等,以帮助相关大学提高教学质量,使其在大学科研资助机制之外,同样获得追求卓越的机会。这些教学卓越计划引导相关大学将自身定位于教学型大学,其中包括私立大学、师范、体育及职业技术院校。之前,由于缺乏大学分类机制,台湾大学纷纷向研究型、综合性大学方向发展,全台湾149所高校只能在唯一的金字塔上排序。

在追求教学(特别是本科教学)卓越方面,荷兰为我们提供了在两所研究型大学基础上

育体系。

打造新学院的案例。2009年,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大学和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合作创办了阿姆斯特丹大学学院(AUC)。该学院师资来自两所大学的知名学者,学生总数为550人左右,实行小班化、全英文授课,第一年基础课程后,学生可以在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三个领域的六个有特色主题中选修专业方向。毕业后联合颁发两所大学的文凭。目前在荷兰,类似的“以本院校合作应对全球竞争”的本科文理学院有五所。

从国际经验看,学术卓越需要政府的推动,但是这种推动并不意味着更多的干预,而是更广泛的授权、问责和有重点的支持。卓越不仅针对科研成果,更包括教学质量的卓越;卓越不仅指个别精英院校的声望,更包括一个国家高等教育系统的整体活力和质量的提升。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教授)

在美国,学术能力评估测试(SAT)有些类似于中国的“高考”,关系着一名学生未来的前途命运。正因为如此,一些在国内高考中可能发生的问题,便也会出现在SAT考试中,比如公平性问题……

SAT 夏季考试:美国大学理事会的错误?

■陈彬 编译

最近,大批美国高中生刚刚参加了2011-2012学年度的最后一次学术能力评估测试(SAT)考试。但对其中某些学生而言:今年8月份还有一个特殊测试正在等待他们,因为这些学生已被收费昂贵的夏季大学预科计划招收。而剩下的学生则必须等待在10月举行的新学年SAT考试了。

作为SAT的官方考试机构,美国大学理事会日前宣布,其与全国资优学生协会(NSGT)达成协议,所有参加NSGT大学预备课程的学员均可在今年8月3日参加SAT考试。而参加这一为期三周的预科课程需要花费4500美元。

对此,SAT计划的执行董事马特·里斯克表示:“我们很高兴与NSGT达成这项协议。大

学理事会和NSGT拥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让学生在大学取得成功,这种独特的夏季考试将进一步帮助我们实现这一目标。”

但是,提高某些孩子上大学的成功几率,真的是大学理事会的使命吗?

在美国,SAT一般每年举行7次考试,但从没有在暑假期间举行过。事实上,面对人们的质疑,里斯克也曾在一份公告中表示,此次设置暑期SAT只是一个试点方案,用以评估夏天可能的考试日期。该份公告提及,由于暑假期间学校和教师在时间安排上存在明显差异,先期试点是唯一可行的方案,成熟后才考虑扩大到更多学生。公告还宣称今年与NSGT的合作并不以营利为目的。

然而有趣的是,在大学理事会公布的最初版本中,并没有透露任何有关试点方案。

约瑟夫·苏亚雷斯是维克森林大学社会学教授。他并不看好这样的“改革”,原因就在于其带有一定的歧视性。他甚至曾就此事专门发布声明,表示此举暴露了大学理事会对外宣称的“SAT是公平扩大接受高等教育范围的重要方式”的虚伪性。因为对于这种前所未有的安排,只有小部分富有家庭才可以承受。“在这项计划中,学生可以购买到一些从未对外提供的SAT资料,进行专门的考前准备,而这些都是要花费巨资的。”

“参与这项计划就意味着告诉这些学生他们是特殊的,值得拥有更多考试机会。将来这些学生会坐这种头等舱飞往精英大学,而其他人必须在10月份去坐经济舱。”苏亚雷斯说,这一方案使如何公平衡量一个人的学业成绩成为了一个谜。

他山之石

栏目主持:年智英

在美国,州级公立高等教育结构是其高等教育的典型特征之一。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结构也是美国高等教育多样性特征的制度基石和保证。

■何振海 杨桂梅

任何关于美国高等教育的探讨,都不可避免地要以各州为具体对象进行深入研究。这是因为,在影响美国高等教育发展的诸多因素中,以州为单位的分权负责制是重要的因素。

根据美国宪法,联邦政府对普通高等院校没有直接管辖权,这导致地方分权管理模式的出现。而在发展高等教育尤其是公立高等教育的过程中,由于各地独特的历史、政治、经济和地域因素的不同,各州的公立高等教育呈现出鲜明的地方特色,并形成了具有创新意义的州级公立高等教育结构。

这种结构大多开始形成于19世纪。长久以来,人们对其进行了大量的分类研究。其中,美国学者弗拉克·博文等人提出的分类标准得到了较为广泛的认同。博文将各州的公立大学划分为四种类型:1.以伊利诺伊等州为代表的联邦型系统;2.以佐治亚等州为代表的统一型系统;3.以密歇根等州为代表的同盟型院校;4.以加利福尼亚等州为代表的同盟型系统。

本文特根据前三种模式,节选伊利诺伊、佐治亚和密歇根三个有代表性的州进行个案分析,以期对美国州级公立高等教育的基本模式做一些概括。

联邦型系统

伊利诺伊州公立高等教育发端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60年代,该州的公立高等教育已初具规模。到1964年,伊利诺伊州已经形成了州立大学、芝加哥教师学院和两年制学院三类公立院校。但当时的公立高等教育尚未形成完整的系统,公立院校间缺乏必要的沟通与协调机制,各类院校的职能也没有明确界定。自20世纪60年代起,伊利诺伊州公立高等教育开始了构建州级系统的努力。1961年成立的州级教育董事会(IBHE)是该州首个州级协调与规划机构。在其主持下,1964年伊利诺伊州建立起一个“多系统系统”的公立高等教育结构。将原本分散管理的公立学院、大学和初级学院整合为若干个子系统,IBHE负责协调各子系统之间的发展,但仅具有规划权和咨询权,而无管理权。

1994年,伊利诺伊州公立高等教育系统已经发展成两大类共5个子系统,其中四年制院校系统包括伊利诺伊州、南伊利诺伊大学系统、摄政大学系统和周日学院与大学系统,另一类型为由49所社区学院组成的社区学院系统。1995年,州议会参议院决定撤销4个四年制公立院校系统中的两个。此番改革后,该州的公立大学变为9所,包括12个分校、社区学院的数量调整为48所,这种格局一直保留至今。

统一型系统

佐治亚州是最早实践公立大学理念的州之一。1785年初,经众议院审议批准,该州第一所公立院校——富兰克林学院宣告成立。到1930年,佐治亚州已经建立了26所公立院校。

1931年,在大萧条中面临危机的理查德·拉塞尔就任佐治亚州州长,重组公立高等教育是其最紧迫的改革任务之一。在拉塞尔的推动下,州议会通过了《1931年重新组织法》。根据该法,成立了包括所有26所公立院校的“佐治亚州大学系统”,该大学系统由系统董事会实施统一管理,各类院校的财政拨款分配、学校职能等均由董事会决定。佐治亚州公立高等教育的基本特征是公立院校数量较少,目前仅有35所公立院校,这使得统一型模式在佐治亚州得以实现。

同盟型院校

目前密歇根州共有各类高校100所左右,其中公立院校45所。在该州的高等教育体系中,公立高等教育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占据了绝对优势地位。从在校生规模来看,2005年密歇根州各类公立院校在校生数量为50.6万,占该年度全州高校在校生总数的80.7%;从学术水平来看,卡内基高校分类认可的密歇根州8所研究型大学中有7所为公立大学。

密歇根州公立高等教育的发展始于19世纪初。1817年,该州成立了第一所公立大学——密歇根大学。在密歇根大学的推动下,该州在19世纪中后期成立了一系列公立院校。各大学由各董事会负责管理,董事会在组成方式上可分为两类:密歇根大学、密歇根州立大学和韦恩州立大学的董事会成员依照宪法由选举产生;其余四年制大学董事会则由州长任命。除公立大学外,20世纪初,密歇根州也成立了一批两年制学院,这些学院大多由政府出资兴办,由各州选举产生的学院委员会进行管理。

受公立大学自治传统的影响,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密歇根州煤业成立了州级公立高等教育管理或协调机构。为了更好地适应20世纪60年代以后公立高等教育蓬勃发展的趋势,密歇根州在1963年的新宪法中重申了公立院校的自治地位。从这个角度来看,密歇根州的公立高等教育体系只是一种松散的院校同盟,与前面两种存在着根本上的差异。

以上所述的三种结构,仅仅是对美国公立高等教育发展的局部展示。事实上,美国各州之间的公立高等教育结构都存在一定差异,而且也都处于不断地改革和调整之中。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改革与调整是美国公立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永恒的主题,而这种完善不仅使其高等教育整体发展保持了旺盛的生命力,也为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高等教育改革提供了实践素材和范本。就此而言,州级公立高等教育模式不啻为美国对高等教育所作出的重要贡献。

美国州级公立高等教育:
基于地方特色的分权治理